

嗜书

文化拟子与变化气质

——读《羽梵》《张载传》引发的思考



读老同学马玉琛长篇小说《羽梵》，看到书中主人公皇甫三兴试图进行文化拟子实验，书中写道：“文化拟子和基因类似。基因借助精子和卵子，由一个身体跳到另一个身体，生命便得到传播和延续。文化拟子无法天生遗传，但它会以模仿的形式，从一个头脑传播到另一个头脑。你完全能够在我的头脑里种下一个有繁殖力的文化拟子，这拟子会大大影响我的思维，并且改变我。”但实验似乎不大成功，究其原因，皇甫三兴悟道：“拟子是传导给多个个体，只有营养汤适合时，才能传导。如有序有效的竞争，只能在心中本来就有善良和宽恕的营养汤的人身上传导。”那么，人究竟能否向善、学做好人呢？

抱着怀疑的目的，笔者查阅了有关资料得

知，“拟子”是1976年英国牛津大学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教授提出的一个新概念。道金斯认为，“如果基因(可以称为‘生命传播单位’)是物质世界那个真正的不朽者，拟子(可以称为‘文化传播单位’)就是精神世界中那个真正的不朽者，精神世界的基因。”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道金斯认为，从社会文化角度看，拟子由人创造，诸如旋律、观念、宣传口号、服装的流行、制罐或建房子的方式等都是，其繁衍的方式是通过模仿过程发生的，它(拟子)将自己从一个头脑转到另一个头脑，“你在我头脑里种下一个有繁殖力的拟子，就等于把观念生在我的脑子里，把我的脑子变成撒播拟子的工具，跟滤过性病毒寄生在寄生细胞的基因机制里几乎完全相同。”“每个人从小到都在头脑中不断种下各种拟子，他的记忆库就是一个拟子复合体。”道金斯将拟子描述为，“在诸如语言、观念、信仰、行为方式等的传递过程中与基因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类似的事物。”

国学创始人张载认为人是可以教育和教化的。他赞同孔子提出的“性相近，习相远”的观点，但对孔子所说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不苟同，他提出了“变化气质”的基本理论，认为人同世间万物一样，均来自于天地宇宙，一方面禀赋太虚的本质属性——至善的“天地之性”，因此从根本上来说人性本善；另一方面禀赋阴阳二气的属性——有善有恶的“气质之性”，因此产生了人性中的“恶”，现实中从而有了圣贤、凡人和不肖之人的存在。他在《正蒙·诚明篇》中指出：“性于人无不善，系其善反不善而已。”要获得原本至善的本性，必须通过后天的努力矫正气质之偏。这就是张载的“变化气质”之道。那么，如何“变化气质”呢？

张载提出了通过“善反之”的途径变化气质的观点，他以为，人之所以不善，人的“天地之性”之所以得不到充分地完全地发挥，是由于

“气质之性”的遮蔽。“善反之”就是要善于发现“气质之性”中的“天地之性”成分，从而认识到“天地之性”才是完美的人性，他在《正蒙·诚明篇》中指出：“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气质之性”不被有学问的人看作是完美的人性。因此，“变化气质”就是以“天地之性”改造“气质之性”，把人的生理和生活欲望置于某种道德观念的控制之下，使所谓的气质“变好”。同时，张载指出：“学”以变化气质。这里的“学”实质上就是接受儒家价值理念的熏陶，对儒家道德进行学习和实践。必须注意这里的“学”不仅指读书学习，而且包含修养实践。张载认为，气质之善虽是人与生俱来所受的定义，但人的善恶所成却取决于人的后天努力——禀气之偏者，可以通过后天不断的“学”，逐渐剔除和矫正“气质之性”中的“恶”，从而最终回归到至善的本性。他在《经学理窟·气质》中指出：“人之气质美恶与贵贱天寿之理，皆是所受定分。如气质恶者学即能移，今人之所以为气所使而不得为贤者，盖为不知学。”这就是张载的“学以变化气质”的基本理论，从而为社会教化活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确立了先天的合理依据，对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和孟子的“性善论”思想作出了重大的理论突破，对其“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传统观点作出了必要的修正，为理学的社会教化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有了理论指导，如何实施呢？

张载认为，社会教化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敦本”，即通过立志在先、虚心诚意、深求义理、笃行实践、勤勉不息等措施，唤起人们对儒家伦理道德的内在自觉，通过“变化气质”之道把儒家伦理道德内化为人的内在德性，其目标就是要使人成为至善的君子或圣贤。二是“善俗”，即通过重在启发、因材施教、适时渐进、以身为教、重视儿童德育等举措，使儒家的伦理道德为社会普遍认同与遵守，养成良好的

社会风尚，从而构建起理想的社会秩序。在张载弟子与子孙的推广下，张载的哲学思想和家规家训还泽被关中大地，教化着当地的民风、社风。张载的弟子吕大临兄弟受其影响，编制了我国第一部完善成文的乡规民约《吕氏乡约》，移风易俗。乡规民约是放大的家训家规，使张载推行礼教、教化风俗的思想更加系统和具体。在张载家规及《吕氏乡约》的熏染影响下，关中乃至三秦“再使风俗淳”，正如明代教育家冯从吾所言：“自是关中风俗为之一变”，或如《宋元学案》所称“关中风俗一变而至于古。”张载自己也说：“关中学者，用礼渐成俗。”

《张载传》作者权海帆指出：“张载的变化气质说，实为其学说的精髓。从人之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而论学——学礼、学德、学做人、学做君子、学做圣人，从而立心立命，达致为尧舜的人设峰巅，是张载的瑰丽愿望，虽不免于幻想，却充满激励上进的积极意义。”

文化者，以文化人也。我们今天所谓的“文化”，究其本意，就是以文化人，即凡以道业诲人为教，人接受此道业而变易其气质以远过迁善，即足以证明善教得行；人接受教诲则在各方面必起若干变革，此变革谓之“化”。所以文化二字合用，是“文治教化”的意思，即以文字、文章、礼乐等文艺形式变化人之气质。

马玉琛在《羽梵》后记中指出：“人类中心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如杂草一样生长起来，而且蓬勃得过头了，人类现代化进程中过激的盲目行为，将鸽子给予我们的和平温暖的诗意生活夷为荒野，几近毁灭……鸽子的得道和殉道，使我幡然醒悟：人的存在，是为了向他者开放，并示爱、相爱、热爱！鸽子！自然！一切！但愿我们人类像作者一样早日幡然醒悟，或如关学传人牛兆濂教诲期望的那样：学做好人。” □王新民

我与书

秋读书学文章

“暑退九霄净，秋澄万景清。”秋天，风轻云淡，天气凉爽，是读书学文的良辰佳境。秋日读书，昼夜皆可，早晚皆宜。

清晨早起，微风习习，秋露凝眸，桂花飘香，秋意袭人。经过一晚的休息，大脑正处于最清醒的状态，思维也更加理性敏捷。此时，捧一本书，或站立窗前，或静坐阳台，无论文学历史、自然哲学、诗词歌赋，还是经典名著、散文杂章，都会在澄明的秋晨中散发出迷人的光彩。

我是个喜欢早起的人，晨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翻开枕边书，或斜倚床头细阅，或徘徊书房朗读。读唐诗的豪放隽永，灵动浪漫；读宋词的清丽婉约，繁华烟雨；读元曲的轻暖与泼辣，入木三分。除了这些，惠特曼的《草叶集》、普希金的《自由颂》、贾平凹的《自在独行》、陈仓的《月光不是光》，都是我的最爱。在翻阅与朗读中，晨曦渐露，朝阳初上，光阴初透，书香滋养心灵，也浸润了一天的好时光。

夜晚，秋虫低鸣，夜色温柔，一轮秋月透过窗棂，照进书房，也照亮了我的心。夜深人静时，气氛是静谧的，心情是平和的，最适合阅读小说和哲学书籍。读贾平凹《秦腔记》，让我触摸到了大秦岭的博大与厚重；读陈彦的《主角》，使我体味到了人间的悲欢离合；读卡勒德·胡赛尼的《追风筝的人》，让我感知到了人性的善与恶；读《菜根谭》，让我懂得了出世、入世的法则；读《道德经》，让我领悟了道法自然。在美好的秋夜，与书中一个个人物邂逅，像遇见久别重逢的故人，血脉一下就连通了，不但醒了脑，还净了心。

秋日读书，随性而为，随遇而安。

秋日气候清爽宜人，读书既可在室内，也可在室外；既可在秋阳里，亦可在雨檐下。一个人安坐斗室，捧一本书、煮一壶茶，书香幽幽、茶香袅袅，书香和茶香你缠我绕，相互交织，内心便多了一份从容淡定。室外喧嚣嘈杂，室内宁静淡然，仿佛世界在我之外，时光安然静好。身处这样的环境之中，最让我心动的是潜心静读汪曾祺的人间系列。从《人间草木》中，我认识了自然界的花鸟鱼虫，领略了南北各地的风土人情，读懂了人世间的百态清欢；从《人间滋味》中，我品尝到了高邮鸭蛋的咸香和老北京萝卜干的清脆，体会到了故乡之于游子的相思和眷恋；从《人间有戏》中，我领悟到了戏如人生，人生如戏的生活真谛。可以说，读汪老的文字，让我如饮甘醪，茅塞顿开。

秋高气爽，秋阳轻暖，步入室外，或置竹椅于露台之上，沐浴在温暖的秋阳下，一边呼吸清爽空气，一边畅谈心仪之书；或坐在公园的廊亭边，一边细嗅桂花的幽香，一边开启书中的故事，都是美妙不过的享受了。此情此景，什么都可以读，什么都可以让你在阅读中脑洞大开。几分惬意，几分慵懒，舒活了筋骨，丰盈了心灵。

古人道：“秋读书，玉露凉，钻科研，学文章。晨钟暮鼓催人急，燕去雁来促我忙。菊灿疏篱情寂寞，枫红曲岸事彷徨。千金一刻莫空度，老大无成空自伤。”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潜心读书时。 □程毅飞

荐读

在古画里自洽于天地

二十四节气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成果典范，它不仅是“天文之学”，更是“人文之学”，体现出中国人独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美学。同时，这套知识体系也是充满无穷诗意的。比如，从字面来理解，“惊蛰”，就是把不吃不喝冬眠了一整个冬天的动物们都叫醒过来，迎接春天的到来，光听上去，“惊”字背后的那股春雷乍响的气象就营造着万物苏醒的热闹盛况，让人好不激动。

这种有关自然节律的科学认识还被古代先民投射到关于个体生命的认知中。除了各种文学、俗信、礼仪、节庆，中国古代的画家们用手中的笔，也生动再现了这种“因时而动，顺势而为”的哲学和美学。其中，又以中国文人画为甚。画家们多将自己内心的感悟寄托到笔下的人物、山水、花鸟鱼虫上，营造“意境”与“心境”。如郑板桥所说：“兰香不是香，是我口中气。”“兰花不是花，是我眼中人。”

在中国画里，二十四节气里的风物被赋予了鲜亮的生命力，从而具有了“人”的品格和情感指向，所以，其表现的是“人化的自然”“社会化的自然”，也是“活化的自然”。经过胡烟的

《纸上寻幽：中国画里的二十四节气之美》解读，与二十四节气有关的中国画，其独特的文化象征、文化隐喻以及审美意象被无穷放大，便有了人味，也便有了活气和生意。

若是看《纸上寻幽》一书里胡烟的点评，会生发这样的感受：与其说顾恺之、王希孟、文徵明的画是文人画，倒不如说是人文画，是“灵魂的功课”。如果说古代画家们是借物抒情、借物言志，那么，《纸上寻幽》给我们树立了一个赏画的标准范式，即要聆听画外之音，捕捉画外之意——要穿过纸墨，去捕捉蕴藏在画里的生命寓意，以及恬静幽深的心灵宇宙。简言之，胡烟带我们在中国画里观看大美的天、地、人，释读磅礴的宇宙观、自然观、生命观，更重要的是，去捕捉画家们作为一个寻常人的幽微的真性情，穿越历史风云，解密古代画家植入画作中的人格象征、隐喻以及精神品性，从而读懂古人、读懂古画，也读懂如画的二十四节气。

比如，胡烟从杨无咎所作的《四梅图》里，首先感受到了以梅作喻的生命也有属于自己的四季轮回，她读懂了杨无咎表面上是借助清幽

的梅花，来自许品格中的清高和疏淡之美，而往深了看，她看到了不想入仕的杨无咎无法理顺自我与环境的关系的痛苦所产生的“张力”传递到纸上后，所发出的“千钧一发的沉寂之力”。胡烟甚至小心翼翼地揣摩杨无咎是不是也如自己一样敏感，但她大胆地判断：“杨无咎的梅，是时刻想从宣纸上逃走的。”

心中有天地，笔下便有众生。以杨无咎为代表的中国画的作者们如此，胡烟亦如此。世间万事万物，包括二十四节气，本无感情，恰是因为欣赏它、表现它、歌颂它的人，有了万般情绪，才使其有了几多趣味。画，到最高境界时，已不是画，亦非技法，而是活生生的如巨澜奔泻的心潮，是方生方死的世间百态。画家们的真性情，恰如二十四节气，有时如春意喧闹，有时如寒雪沉静。

《纸上寻幽》，“寻”的是古人对四时的感应和再现，当然，“寻”的也是今人对情境的复现和再造，对情感的体验和超越，“寻”的是一种深度的心灵实验，寻的是一种高级的精神之“幽”——二十四节气何以如画，亦何以入画？胡烟将心与古人贴在一起。不！她似乎穿越了



时空，摇身一变成为古人，她就是金农、宋徽宗、郭熙、边寿民……从《纸上寻幽》里，我们读懂了文人画家们的自愈、自娱、自喻、自怜甚至自恋，赏得深了，便可会心一笑，也可怡然自洽。 □潘飞

陕西省总工会主办 1950年2月7日创刊 邮发代号51-7 陕西省一级报纸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61-0015 陕工网网址http://www.sxworker.com

欢迎订阅 2023 年 陕西工人报



全年价格 336元/份



订阅方式

- 一、各市(区)总工会(含西安市三环以外)请前往就近邮局订阅;
- 二、各省级产业工会、各单列单位工会及下属单位、西安市三环以内所有单位，统一订阅方式:
- 1.关注“陕西工人报”微信公众号，下载征订单;
- 2.登陆陕工网http://www.sxworker.com下载征订单;
- 3.请在邮箱下载征订单(b87345725@163.com 密码:SG82023sgb#);
- 4.咨询电话:刘海英 18133921020 029-87345725



扫二维码